

日治時期初始臺語教材作者侯野保和與岩永六一 之考察*

伊原大策
日本筑波大學

日治時期出版的臺語教材，尤其是屬於最初期的臺語教材有不少編輯上的失誤與混亂，而且含有不少非臺語之特徵。雖說是臺語教材，但除了與日語相似的句子之外，有時還具有明顯受到北京話影響的語法成分。因此，要提及最初期臺語教材的特徵與價值時，須先探討這些教材到底由甚麼樣的人，施以甚麼樣的編輯過程，然而前人研究似乎從未著眼於此。本研究將以日治時期最初的兩本臺語教材為對象，結合筆者所查到的相關事證及零星資料，針對「比志島混成支隊」（登陸於澎湖島的日軍部隊）的軍隊翻譯官錄用過程，以及兩書作者侯野保和與岩永六一在澎湖與臺灣本島的譯事活動進行深入探討。透過這項考察刻畫兩位翻譯官的人物形象，以凸顯重新評估這兩本臺語教材所顯現的價值與特徵。

關鍵詞：臺灣語集、臺灣日用土語集、臺灣言語集、侯野保和、岩永六一

1. 前言

清朝在甲午戰役敗戰之後，把臺灣割讓給日本。但日本剛開始領有臺灣之時，臺灣似乎不是吸引一般日人關心的對象。例如，1897 年在東京出版的介紹臺灣的書上寫著：「臺灣我版圖に歸してより既に二星霜、然るに其形勢未た我国人一般に知悉せられず、或は外国の觀をなし遼東半島と同一視するも

* 本文為 2014 年 10 月成功大學主辦的「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之修訂稿。2012 年 4 月至 2013 年 1 月，筆者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訪問學人身份承蒙許雪姬教授懇切指導，本研究的主要部份也是在臺史所研究室中寫成。特此敬表衷心的感謝！

のなきに非ず（筆者譯：臺灣歸於我國版圖之後已有二年，然而臺灣的情勢對於一般老百姓而言仍然一無所悉，甚至有人誤以為是外國，而將臺灣視如遼東半島）（參見松島剛、佐藤宏（1897）之序文）。對一般日人來說，關心的對象反而是遼東半島；在眾人心目中，臺灣與大陸北方的區別並不明確。因此日本領臺之初，對臺灣的語言並沒有充分的預備知識，看當時的資料就可得知開始統治之後才慌忙著手治理語言問題。據臺灣總督府資料顯示，¹等到舉行始政式（1895年6月17日）之後才從廈門訂購幾部當時唯一的福建話教材《英華口才集》（Macgowan (1871) *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²可見臺灣總督府的各部局都要憑著這本教材以速成方式掌握臺灣土語。

如眾所知（參見許雪姬 2006:41、冨田哲 2008:56 等），關於統治臺灣之時所需要的人才，也因為日本沒有深刻地認識到臺灣的語言，所以投入臺灣的人才也不一定是熟悉臺灣語言與文化的專家。因此接管臺灣之時隨行的翻譯官，幾乎都以日本進入大陸北方而備選的人才為準。所以，反映當時的翻譯官情況即有如下記載：「我征臺軍遼東の野より本島に転戦し来りし部隊中には若干の北京語に通するもの包含せられたり...當時爾余の者にして本島語を解する者皆無なり...（筆者譯：我征臺軍從遼東平野轉戰臺灣島的部隊中有人略通北京話...但當時其他懂臺語的人完全不存在...）」（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4:912）。

在此情況之下，日人為謀求臺日雙方的溝通，陸續發行了不少臺語教本。僅於馬關條約訂定後的一年之中，至少有十本以上是由日人所編寫的臺語教本，至於內容則未必是豐富可靠的。

已有數項前人研究指出，日治時期最初出版的臺語教本受到北京話的影響相當深刻（吳守禮 1955: 2；樋口靖 2012: 34 等）。儘管是臺語教本，但會話句裡採用「別+V」句型（禁止表現句型）也算是其一。其實初期臺語教本裡所見到的非臺語因素不只是這一個，還有不少其他例子（伊原大策 2013: 78-84）。因此，要提及最初期臺語教本的特徵與價值時，須先探討這些教本到底由甚麼樣的人，採取甚麼樣的編輯過程，然而前人研究似乎從未著眼於此。

本研究將以日治時期最初的兩本臺語教材為對象，結合筆者所查到的相關

¹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是由日治時代總督府管理的公文。因屬公文書性質，且並未出版，無法以特定作者、編者名稱顯示。故以資料名稱直接呈現。《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7 冊 1 號、第 17 冊 10 號、第 17 冊 26 號等裡有學務部與殖產部的訂書記錄。

² 根據村上嘉英（1965），初版是 1871 年發行，但這版本是稀覯本，筆者所使用的是 1892 年刊行的第三版。

事證及零星資料，針對「比志島混成支隊」（登陸於澎湖島的日軍部隊）的翻譯官錄用過程，以及兩書作者侯野保和與岩永六一在澎湖與臺灣本島的譯事活動進行深入探討。透過這項考察刻畫兩位翻譯官的人物形象，並據以做為重新評估這兩本臺語教材所顯現的價值與特徵的基礎材料。

2. 資料運用及研究方法

據吳守禮（1955: 1）研究，由日人所編的最初臺語教本是包含 1895 年 5 月「緒言」的《臺灣語集》（另一名叫做《臺灣日用土語集》）（侯野保和編，1895 年 7 月 18 日發行）。但稍後出版的《臺灣言語集》（岩永六一編，1895 年 8 月 29 日發行）其「はしがき（編者譯：緒言）」日期也在 1895 年 5 月。這兩本書的緒言還提到所編寫的地點是澎湖島，因此可知這兩本教材於同一時間、在同一地方由兩位翻譯官分別編寫。

侯野保和與岩永六一以最初臺語教本的編者名垂後世，但他們前往澎湖島的過程與在澎湖島的譯事活動，從來無人知曉。最初期臺語教本既然在澎湖島上編寫，就理當探討在澎湖島的翻譯官以何種程序受到錄用，其後從事於何種任務，然而前人研究似乎從未提及於此。³主要原因是相關材料幾乎沒人發現過。

雖然高階軍官的軍事活動會記錄在正式的戰史裡，但翻譯官的譯事活動不一定會留存在歷史中。然而軍隊裡的翻譯官由於任務的特殊性，有時會面臨歷史上的轉捩點。所以可以期待非官方的戰史或其類似資料上遺留若干他們活動的痕跡。實際上，在民間人士所寫的戰爭紀錄裡，有時會提到一般阿兵哥以及層次不高的軍官所參與的軍事活動。本研究著眼於這點，除了正式的戰史之外，也將援引民間戰史及特務機關資料。其實，民間戰史恐怕缺少充份的可靠性，所以是經過層層篩選後才做為本文所選取的資料。

3. 派往臺灣的翻譯官錄取過程

甲午戰爭之時有不少日本特務在大陸從事搜集軍事訊息的活動，其中對日方而言取得最卓越成就的是當屬宗方小太郎。他是當時為日本海軍偵察清國軍

³ 許雪姬（2012）是提到侯野保和以及岩永六一的極少數研究之一。但因為它所依據的是臺灣總督府資料，故以兩人登陸臺灣本島後的活動為主。

事機密的特務。他雖僅是一位民間人士，但對軍事方面的影響力極大。據資料顯示，馬關條約的部份條文是由他所撰寫的。⁴

因此，可望透過他的資料找到甲午戰爭之時所進行的特殊活動的記錄。實際上，〈宗方小太郎日記〉(大里浩秋 2008) 詳盡地記錄著在當時非常緊迫的世界局勢下，從知名人士到無名小卒投入戰爭任務的情況

在 1895 年 1 月至 3 月的敘述中提到宗方小太郎從廣島吳軍港搭乘旗艦松島號前往澎湖的過程。

明治 28 年

正月二十四日 雪...本營より召喚に応じ出頭す。通譯官取締を命ぜらる。(1895 年 1 月 24 日 下雪...奉大本營召喚，受命為招聘通譯官負責人。) (大里浩秋 2008: 72，筆者譯)⁵

同樣的記錄又在兩天後的日記中出現。

正月二十六日 晴天、夜雨...本營よりの召喚により出頭す。下午神保客棧に至り，通譯官寄宿舍の布置を為す。(1 月 26 日 晴天，晚上下雨...奉大本營召喚，下午前往神保客棧安排通譯官宿舍。) (大里浩秋 2008: 73，筆者譯)

可見宗方小太郎在廣島為大本營擔任招聘翻譯官負責人時，就開始為錄用的人才做各種準備。之後，宗方小太郎又陸續主持不少翻譯官的面試。

二月三日 晴天...下午大本營に出頭す。五時帰る。是日より新通譯官三名入舎。⁶(2 月 3 日 晴天...下午奉大本營召喚前往大本營，5 點回來。自今日起，有 3 名新通譯官入住。) (大里浩秋 2008: 73，筆者譯)

又

⁴ 在明治 30 年 10 月 29 日的〈宗方小太郎日記〉裡，宗方小太郎引用報紙上介紹自己的報導「日清戦役の大功者として天顔に咫尺せし人なり...台湾割讓の条約文を起草し、第一の諭告文を作りしは宗方氏なり」(宗方小太郎做為甲午戰爭之大功臣，直接面謁天皇...草擬割讓台灣的條文，並為第一諭告文擬稿)(大里浩秋 2010: 39，筆者譯)。

⁵ 下底線為筆者附加。以下引文之下底線亦同。

⁶ 〈宗方小太郎日記〉的原文是手寫的資料。如大里浩秋 (2008: 31) 所說，無法解讀的字有很多。至於在這裡所引用的「入舎」，據大里浩秋 (2008: 73) 寫著「入会」，但〈宗方小太郎日記〉「二月四日」與其內容類似的上下文裡曾用「入舎」一詞，故有可能將「入舎」誤為「入會」。因此在這裡改為「入舎」。

二月四日 晴天。午前大田敬孝と共に通譯官高野兄弟、猿渡仙太郎の三名の試検を為す。…下午本營に出勤す。是日通譯官松本龜太郎帰来入舎す。(2月4日 晴天。下午與大田敬孝一起進行通譯官高野兄弟、猿渡仙太郎等三名的錄用考試。…下午前往大本營上班。今天通譯官松本龜太郎回來住宿舎。)(大里浩秋 2008: 73, 筆者譯)

可見，宗方小太郎親自對來應徵的翻譯人才進行面試，選拔看中的人選並安排入住宿舍。

二月九日 晴天。午前緒方、白岩、中野を招き猪肉を食ふ。竹田津、岩永來訪。下午出て尾本寿太郎の病を第三分院に訪ひ、緒方等の寓に歸る。竹田津、岩永兩生の試検を為す。(2月9日 晴天。上午請緒方、白岩、中野吃猪肉。竹田津、岩永來找我。下午去第三醫院分院為尾本壽太郎看病後，回到緒方等的寓所。對竹田津、岩永兩人進行考試。)(大里浩秋 2008: 74, 筆者譯)

由此可知，宗方小太郎 2 月 9 日召喚竹田津與岩永兩人出來進行考試。其後三日，2 月 12 日宗方小太郎親自前往訪問住在外面的岩永。

二月十二日 晴天…山勇に岩永生を訪ひ、副官部よりの旨を伝へ、郵便局に至り家大人に金拾円を郵送す。(2月12日 晴天。前往山勇找岩永先生傳達副官部之意旨，之後到郵局匯款拾円給家屬。)(大里浩秋 2008: 74, 筆者譯)

透過以上記載，可知宗方小太郎錄用翻譯官的過程。首先，他先親自面試，將面試成績向大本營副官部匯報，得到副官部批准後發給應徵者錄取通知。⁷

〈宗方小太郎日記〉中還有些條文值得留意。

二月十八日 雨天。午前郡嶋縫次郎、寺田作之助兩生を試検す。長崎鈴木行雄、佐賀西村忠四郎、宇土篠原由誠の信到る。下午共に永田虎之助、⁸岩永六一兩生來談。(2月18日 雨天。上午為

⁷ 此外，匯款給岩永家屬也令人頗感好奇。在〈宗方小太郎日記〉的其他地方，又看到宗方小太郎在大本營管理部代領薪水匯款給錄取翻譯官家人的記錄。可見，宗方小太郎在這裡匯款給岩永家人是為了準備不久會在國外發生的戰爭，故先解除家人經濟上的後顧之憂。

⁸ 至於「永田虎之助」，據大里浩秋 (2008: 74) 作「永田作之助」。但〈宗方小太郎日記〉「三月初四日」與「三月十四日」記載的類似上下文裡稱之為「永田虎之助」。而所謂的「永

郡嶋縫次郎、寺田作之助進行考試。接到長崎的鈴木行雄、佐賀的西村忠四郎、宇土的篠原由誠來信。下午永田虎之助、岩永六一兩位來訪與我談話。」)(大里浩秋 2008: 74, 筆者譯)

這裡提到了幾個人物的名字，這幾個人後來在日本取得臺灣之後，總督府資料上也可以找得到。⁹當時的翻譯人才似乎也積極地與宗方小太郎取得聯繫。尤其是鈴木行雄僅在這年 1 月到 3 月的 3 個月之間就寫了 10 封信給宗方小太郎(大里浩秋 2008: 72-78)。只是內容無法知道，但因 1895 年 10 月 1 日在臺灣總督府辦了他的錄用手續(《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523 冊 21 號)，所以可推估他所寫的 10 封是想要應徵翻譯官的信函。透過這份資料，可知不少由宗方小太郎錄用的翻譯人才，後來被派到臺灣本島。

尤其是永田虎之助，他的名字在「混成枝(依原文記載)隊人名人員馬匹表」裡可以找到(參見堀江八郎(1897: 228)的卷末表)，所以可知他是比志島混成支隊的翻譯官之一。

在這裡還提到岩永六一的名字，所以可知先前所錄用的「岩永」無疑是最初期臺語教本的編者岩永六一。

因此，到了 1895 年 2 月中旬的時候，臺灣的翻譯官由宗方小太郎錄取了一大批人。但光憑他的日記，無法知道他選出翻譯人才時，是否顧及派遣地的語言情況。

三月六日 晴天。...參謀部より臺灣圖、臺灣誌外二類を受取る。...諸氏と出て宇品に至り、混成支隊際附通譯官諸氏及び長岡護美公、徳川篤敬侯、醍醐侯並に隨行員山田珠一列の軍隊慰問の爲め新占領地に赴かる、を送る。(3月6日 晴天。從參謀部除了《臺灣圖》、《臺灣誌》之外還接到二書。...與諸位齊赴宇品，混成支隊數名通譯官與長岡護美公、徳川篤敬侯、醍醐侯及隨行員山田珠一歡送軍隊前往新領地勞軍。)(大里浩秋 2008: 76, 筆者

田作之助」在其他地方並未出現。因此在這裡可視為讀解辨識上有失誤，將「永田作之助」改為「永田虎之助」來引用。假使這裡所謂的「永田作之助」與「永田虎之助」是不同的人，但 3 月 4 日之前由宗方小太郎錄取「永田虎之助」一事十分明顯，所以不會牽扯到本論文的論旨。

⁹ 《臺灣督府公文類纂》第 46 冊 3 號(郡嶋縫次郎)，第 9523 冊 21 號(鈴木行雄)，第 107 冊 66 號(竹田津明治)，第 42 冊 78 號(尾本壽太郎)，第 44 冊 24 號(高野兄弟=高野源之助、高野熊吉)，《臺灣新報》1896-12-15 版次 02(永田虎之助)。

譯)

然而，在〈宗方小太郎日記〉上找不到侯野保和的名字。但在 3 月 6 日的時候，侯野保和已算是所謂的混成支隊的「通譯官諸氏」之一。根據臺灣總督府資料（《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3 冊 18 號），侯野保和是 1894 年 11 月 9 日當了大本營陸軍通譯之後，1895 年 2 月 17 日受任為混成支隊翻譯官。宗方小太郎在大本營擔任招聘翻譯官任務是 1895 年 1 月 24 日，¹⁰所以估計侯野保和與宗方小太郎經不同管道錄取之後，到 1895 年 2 月中旬受到大本營的派任，與岩永六一和永田虎之助同一時間配屬到混成支隊。

經過以上過程，攻打澎湖島的準備完畢後，3 月 11 日宗方小太郎與翻譯官離開廣島吳軍港，經過佐世保後前往澎湖島（詳見參謀本部 1907(第六卷): 243；大里浩秋 2008: 7）。

這裡還有一點值得留意：去攻打澎湖島的 5 天前，宗方小太郎才從大本營拿到《臺灣圖》、《臺灣誌》等有關臺灣的基本資料，可見他原來對臺灣的認識不夠深。透過這點就能推測他對當時臺灣人所用的語言也知道得不多。

至於做為明治後期的「支那語」翻譯主考官，在前人研究上一般比較熟悉的是谷信敬。因為他所錄取的翻譯官被分配到「關東に臺灣に内地に各要所(筆者譯：於大陸、臺灣、日本内地之每一個要地)」，¹¹而谷信敬採用翻譯人才時是否充分認識到北京話與臺語之區別，確實值得懷疑。同樣地，宗方小太郎選擇攻打澎湖島的翻譯人才時，是否把臺語放在心上進行篩選也值得懷疑。宗方小太郎似乎不分語種地進用翻譯人才。至少，他所錄取的岩永六一編寫的《臺灣言語集》裡，臺語表記法與會話句型上很難找到岩永六一受過臺語(廈門話)訓練的蛛絲馬跡。¹²

在此不妨看看宗方小太郎招聘翻譯人才的情況。雖然沒有找到招募翻譯人才的直接資料，但日俄戰爭時的記錄原本就存在：「(明治)三十七年一月...福島少将より通譯官選挙の委託を受け熊本、鹿兒島、福岡、大分各地の諸人に檄書して国難に赴かしむ(1904 年 1 月...宗方小太郎受福島少将委託，向熊本、鹿兒島、福岡、大分各地人士發出檄書籲請共赴國難)」(神谷正男 1975: 679，

¹⁰ 前述〈宗方小太郎日記〉「正月二十四日」。

¹¹ 《臺灣日日新報》1916-09-17 版次 03。富田哲 (2010: 169) 也採用這筆資料。《臺灣日日新報》與《台湾新報》皆受台灣總督府控管，且屬公文書性質，故正文中以資料名稱直接呈現。

¹² 《臺灣言語集》不少內容是從其他北京話教本抄襲過來而編撰的。詳見伊原大策 (2013)。

筆者譯)。因為甲午戰爭時，宗方小太郎聘任的翻譯人才往往來自九州各地(熊本、鹿兒島、福岡、大分等地)，所以根據前述資料，可以推測故鄉為九州熊本的宗方小太郎在招聘甲午戰爭翻譯官時，也同樣以九州地方為對象進行人才徵募。

當時學過漢語的翻譯人才之間似有相互交換聯繫的某種人際網絡。如，〈宗方小太郎日記〉「二月十八日」記載的鈴木行雄，雖然他給宗方小太郎寫過好幾封信，但把鈴木行雄直接介紹給臺灣總督府並找到翻譯官職位的正是佐野直記。佐野直記是鈴木行雄在北京留學時的同學(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9523冊21號)，也是另一本初期臺語教本《臺灣土語》的編者。且佐野直記原來與宗方小太郎之間有所往來，他們倆也算是同學，宗方小太郎來臺之時，佐野直記為宗方小太郎提供自己的房子做為宗方小太郎的寓所(見《臺灣新報》1897-10-28版次02)。

明治初期去北京留學的人才之中，不少是出身於長崎通事的後裔(六角恒広 1988)，¹³所以可以推測相互交換聯繫的人際網絡之中有長崎通事的後裔在內。就這一點看來，長崎通事裡有一家叫岩永一門，至少從江戶時代享保9年(1724年)就世代代以翻譯為家業直到江戶末期的安政年間(穎川君平 1897: 6a, 82b, 103b)。¹⁴故鄉為長崎的岩永六一(參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44冊94號以及《臺灣日日新報》1905-02-21版次02)很可能正是長崎通事岩永嘉十郎的後裔，但由於資料不足尚待查明。

4. 翻譯官在澎湖島的譯事活動

關於澎湖島攻略之際的比志島混成支隊情況，有一部民間戰史寫得十分詳盡，就是堀江八郎所編的《南征史》(堀江八郎 1897)。這本書雖然不是由軍部所寫的正式戰史，但與當時流行的娛樂性通俗讀物大有不同。這本書開頭附有由比志島義輝(比志島混成支隊司令官)所寫的序，接著還有緒言說：「本書ハ予曾テ從軍中ニ編纂セシ所ニシテ其記事ハ咸ナ親睹実践ニアラサルナク，一事ノ發生スルアレハ随テ之ヲ筆記シタルモノヲ蒐集シ且ツ其部局ニ當レル人々ニ就キ訂正ヲ加エタルモノナリ」¹⁵(筆者譯：本書所寫的內容都是我

¹³ 參見第 I 篇第一章和第 II 篇第一章、第二章。

¹⁴ 岩永的先祖本姓「巖」，而岩永則是沿用母系姓氏之故。

¹⁵ 為了使它易懂，由筆者加以句讀。以下的引文有時也同樣加上句讀。

自己親眼目睹的，無一例外。每逢軍中有一件事情發生，我就隨時寫在筆記本上。然後請有關人員查驗後才編寫)」。可見這本書寫得很謹慎。實際上，這本書所寫的內容包含不少與其他相關資料符合的事實。¹⁶所以，這份資料的可信度相當高。

《南征史》不但提到戰鬥的情況，還仔細地記載戰線後勤業務的情況。在卷末附記的「混成枝(依原文記載)隊人名人員馬匹表」之「通譯官」欄位裡寫著淺野源二郎、永田虎之助、侯野保和、岩永六一等四位的姓名(參見堀江八郎(1897: 228)之卷末表)。根據這表格的寫法，可算是所有通譯官的名字都寫在裡面了。從來無人知曉的澎湖島上通譯官的全貌在此終於揭開謎底了。

除了《南征史》之外，還有幾本有關澎湖島的民間戰史。例如，根據特務的視角以冷靜而透徹的眼光記下戰鬥情況的《澎湖島從軍日記》(宗方小太郎)(神谷正男 1977)，有時提及無名戰士小故事的《日清戰爭始末》(遠藤永吉、岡崎茂三郎 1895)、《征臺顛末》(市毛淺太郎 1897)、《日清戰史》(川崎三郎 1897)等。

以下採取官方戰史《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參謀本部 1907)，同時也應用前述民間戰史，以梳理澎湖島上翻譯官的譯事活動。

下文是宗方小太郎描寫登陸澎湖島的情況(見神谷正男(1977: 588)的〈澎湖島從軍日記〉)。

三月廿三日 第一遊擊九時三十五分砲擊開始...十二時十分上陸
...二時二十分陸軍前衛陸戰大隊上陸終るの信号あり。(3月23日
第一游撃隊9點35分開始砲擊...12點10分登陸...2點20分傳送
信號報告陸軍前衛陸戰大隊登陸完畢。)(筆者譯)

宗方小太郎所寫的文章果然是一份行家的軍事記錄，但也正因為如此，他僅僅根據軍事專家的觀點提及展開軍事力量的情況而做記錄。於是參閱參謀本部(1907)《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確認同一時刻的記錄是否相符，就可確認以下的內容。

(3月23日午後一時頃)岩崎少佐ハ第一、第二中隊ノ上陸スル
ヤ直ニ之ヲ率キ急進シテ上陸点ノ北方約四百米突ノ小高地ヲ占
領シ、第一中隊ヲシテ菓葉郷、第二中隊ヲシテ良文港ノ方向ヲ

¹⁶ 例如與大里浩秋(2008)所寫有關岩永六一的記錄，以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3冊18號有關侯野保和的記錄相符。

搜索セシメシモ共ニ敵ヲ見ス。惟土民ヨリ馬公城ニ敵兵約五千人アリトノ情報ヲ得タルノミ。(3月23日下午一點左右，岩崎少佐等第一、第二中隊登陸後，馬上率領部隊佔領距登陸地北方約400米的高地，並派第一中隊到菓葉鄉、第二中隊到良文港的方向搜索，但未見敵人。只聽到當地人所說的馬公城約有五千敵兵的消息。)¹⁷ (參謀本部 1907(第6卷): 251，筆者譯)

關於此一場景，遠藤永吉、岡崎茂三郎 (1895) 的《日清戦争始末》寫得更為詳細。

この日(3月23日)無事に(澎湖島への)上陸を終りたり。而して第一大隊の裏正角湾文良(依原文記載)港に上陸するや間もなく、斥候をして近傍の村落菓葉郷に敵兵の有無を探らしめ、又俣野通譯をして土人に就きて糺さしめたるに敵兵の隻影だもなきこと明白したれば、比志島隊長は直ちに前進して... (3月23日平安登陸完畢。第一大隊登陸到裏正角灣文良(依原文記載)港之後，馬上派斥候到近傍村落菓葉郷打探敵人動向，還讓俣野通譯官直接跟當地人詢問，確定附近毫無敵人蹤跡，於是比志島隊長即刻前進...) (遠藤永吉、岡崎茂三郎 1895: 367，筆者譯)

同樣的記錄也在比《日清戦争始末》晚兩年出版的《征臺顛末》(市毛淺太郎 1897)裡出現。

(3月)廿三日...混成支隊ノ裏正湾文良(依原文記載)港ニ上陸スルヤ、衆皆勇躍シテ進ム。蓋シ陸兵地ヲ見ザルコトニ旬日、今日始メテ異域ノ地ヲ踏ミ、今日始メテ異姓ノ人ヲ見ル。而シテ地ハ是レ敵地、人ハ是レ敵人、士氣ノ奮躍想フベキナリ。先ツ斥候ヲ派シテ敵情ヲ探ラシメ、又俣野通譯官ヲシテ土民ニ就キ其動靜ヲ審糺セシメタルニ近傍ニ敵ノ隻影ダニアラザルコトヲ確カメタリ。是ニ於テ比志島枝(依原文記載)隊長ハ直チニ... (3月23日混成支隊一登陸文良(依原文記載)港後，大家踴躍前進，登陸的兵卒有二旬日未見敵兵，而今日踏入異國之地，才見到異姓之人。這一帶正是敵方佔據地，這裡所住的人就是異國之人，怎能不奮戰。先派斥候偵察敵情，又派俣野通譯官直接

¹⁷ 括弧是筆者所補。以下同。

跟當地人詢問敵方動靜之後，確定附近並無敵人蹤影。故比志島支隊長立即前進...)(市毛淺太郎 1897: 133, 筆者譯)

類似的記述也在川崎三郎(1897(卷7): 16)可見。大概是根據同一消息而寫成的。根據這些資料顯示，可知侯野保和在戰鬥的第一線與斥候一起在敵前登陸，直接跟當地的澎湖人偵查敵情。

至於身份為翻譯官的侯野保和為何被選為敵前登陸人員？《日清戰爭始末》、《征臺顛末》、《日清戰史》等裡沒有寫明。但據侯野保和自己所寫的履歷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3冊18號)，侯野保和參加澎湖島作戰之前精通五種外語(英語，福州話，廈門話，北京話，廣東話)之外，還曾經從事海外事業顧問類行業。因此登陸澎湖島時，他的語言能力想必受到很高的評價。

日軍登陸之時的良文港附近算是相當落後的地方，資料顯示「人家ハ不潔ニシテ...畑ハ多クアレドモ皆粗因」(住屋不清潔...田地雖多，但皆很貧瘠(町田政壽 1994: 56, 筆者譯))。¹⁸在當時的澎湖鄉下地方，登陸的兵慌馬亂之下，一時找不到會講北京話的當地人，所以侯野保和的臺語(廈門話)能力勢必起了很大的作用。把《日清戰爭始末》、《征臺顛末》、《日清戰史》的記載綜合起來，可知參謀本部(1907)《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記載的「惟土民ヨリ馬公城ニ敵兵約五千人アリトノ情報(筆者譯：只聽到當地人所說的馬公城約有五千敵兵的消息)」，應是透過侯野保和所講的臺語(廈門話)得知的。

歷經以上過程，比志島混成支隊完成登陸作戰之後，為將澎湖島控制在實質支配之下，設立了行政廳。

(3月27日)行政廳ハ澎湖鎮署内ニ設ケラレ、海軍少將田中綱常之ガ長官ニ任ゼラレ、陸軍歩兵中佐清水直之ガ補佐タリ。其他ノ臨時補助憲兵士官一名、憲兵及ビ臨時補助憲兵下士卒十數名、通譯官、雇員各數名アリ。各課ヲ分チテ励精事務ニ従ヘリ。

(3月27日行政廳設立於澎湖鎮署内，海軍少將田中綱常受命為長官，陸軍歩兵中佐清水直之受命為補佐。其他另有臨時補助憲兵士官一名、憲兵及臨時補助憲兵下士卒十數名、通譯官、雇員各數名。他們被分配到各部門投入行政業務。)(市毛淺太郎 1897:

¹⁸ 町田政壽(1994)是參與登陸澎湖島戰役的一名兵卒的日記。這裡所寫的內容之中有不少事項與參謀本部(1907)符合。可見這份資料的可信度相當高。

159, 筆者譯)

此處雖然提到「通譯官、雇員各數名」，但沒有寫明他們的名字。然而比志島混成支隊的翻譯官共有四名（見堀江八郎 1897: 228 之卷末表中的〈混成枝隊人名人員馬匹表〉），可見所有的翻譯官在各個部門都得致力於行政業務。

至於行政廳的主要業務內容為何？川崎三郎（1897）《日清戰史》記載：「同廳事業ノ第一着手トシテ、順民綏撫ヲ主トシテ、土民ノ恭順ヲ表シ来ルモノハ、左ノ如キ票札ヲ下付シ、以テ保護ノ證ト為ス」（本廳事業中首要之務是綏撫當地百姓，並予立誓恭順之當地民眾給予如左示票札做為保護之證）（川崎三郎 1897(卷 7): 38, 筆者譯）。可見翻譯官在這裡的主要任務是與「土民ノ恭順ヲ表シ来ルモノ」（筆者譯：立誓恭順的當地民眾）進行語言溝通。

因此，翻譯官在行政廳裡為當地人翻譯之外，還要從事相關行政事務。保護佔領地的當地人時，侯野保和的臺語（廈門話）應該有效地發揮了作用。

同樣地，岩永六一也做為「通譯官、雇員各數名」之一，從事行政廳的職務。其實，如後面所述，岩永六一不久在澎湖島官署當了聲名赫赫的大官，調到臺灣本島之後，也以官員的身份貢獻給臺灣縱貫鐵路建設並敘為勳七等。可見岩永六一的行政官起點就在這裡。

在此情況之下，比志島混成支隊考慮到治安不穩，於是在澎湖島上設立民生廳，企圖透過當地鄉紳鄭輔德維持民心的安定。

四月六日、民生廳ハ之（指鄭輔德）ヲ召シ勸民老ノ名ヲ附シ懇諭スルニ、專ラ居民ノ歸家安業ヲ勸告スベキヲ以テス。彼曰ク...（4月6日，民生廳召喚鄭輔德給予「勸民老」稱號致力於勸導百姓返家安居樂業。曰...）¹⁹（堀江八郎 1897: 151, 筆者譯）

不久之後，澎湖島上還設立了「軍紀隊」企圖維持軍紀。在這裡也可推知翻譯官的語言能力是起作用的。

四月九日ヲ以テ軍紀隊ナルモノヲ設置シ以テ軍紀風紀ヲ嚴ニシ島中一般ノ安寧秩序ヲ監セシメタリ...其ノ編成及職務左ノ如シ...通譯官一名 侯野保和。(4月9日設立了軍紀隊，企圖振興綱紀並監督島上的安寧秩序...其組織及職務內容如左...翻譯官一名

¹⁹ 堀江八郎（1897）接著還提到鄭輔德與民生廳之間所進行的交涉過程，引文為日語文言文，雖然無法確認當時以甚麼語言進行交涉，但根據在神谷正男（1977: 589）的相關記載，4月6日交付鄭輔德的文書應當是以文言漢文書寫的。

侯野保和。(堀江八郎 1897: 113, 筆者譯)。

之所以設立軍紀隊，是因為取締軍紀紊亂，但也因「土人ノ不逞者ヲ制スル為」，即為了扼制當地的不逞之徒（堀江八郎 1897: 113, 筆者譯），所以需要精通當地語言的人才。侯野保和之所以被選為軍紀隊成員，是因為他具有臺語（廈門話）能力。

再說，趁戰時的社會混亂，圖謀暴利的商人也很常見，於是 4 月 22 日開始進行市場調查管制物價，以便經濟活動穩定下來。在當地的市場調查，想必是翻譯官充分發揮語言能力的舞臺。堀江八郎 (1897) 的《南征史》刊登魚類 18 項及豬肉、雞肉、雞蛋等物價管制表。其中對魚類名稱，除了漢字之外還有以日語片假名表示澎湖島當地發音。例如：

(4 月 22 日)

澎湖島名称 鮫□²⁰

土音 カーラー

日本名称 鯛

量數 一斤百六十目

価額 七三 (堀江八郎 1897: 153)²¹

提及翻譯官活動的記載還有幾個片段。以下根據《南征史》引用。

(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 通譯官岩永六一ハ、澎湖島ハ既ニ我版圖ニ帰ス、島民ニ日本語ヲ教授スルハ今日ノ急務ニシテ、将来ニ大ニ利アリト。乃チ希望ノ少年ヲ集メ、公務ノ余暇ヲ以テ日本語ノ教授ヲ始メシニ... (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翻譯官岩永六一認為既然澎湖島已屬我國版圖，給島上老百姓進行日語教育是當務之急，也有益於日本國的將來。於是召集願意學習日語的少年，

²⁰ 至於「鮫□」，因為沒有字碼，只好以合成字表示。「偏：魚」+「旁：歷」。

²¹ 物價管制表與《臺灣言語集》(岩永六一)和《臺灣語集》(侯野保和)裡所採集的魚名相比，就能得知饒富趣味的事實。《臺灣言語集》所舉的七種魚名之中，與統制價額表符合的魚名只有三種，至於《臺灣語集》所舉的七種，則沒有一種符合。在這些最初期的臺語教本中，很難找到翻譯官進行市場調查成果的跡象。這表示翻譯官的市場調查經驗並沒有直接反映在臺語教本上。這個事實可以做為推測初期臺語教本編輯過程的一個參考。

趁著公務餘暇，教授他們日語...)(堀江八郎 1897: 156, 筆者譯)。

登陸澎湖島不久之際，岩永六一就把佔領者的眼光放遠到企圖在當地普及日語，召集願意學習日語的少年進行日語教育。此舉與其說是翻譯官的構思，不如說是行政官的思維。可見岩永六一在行政廳「各課ヲ分チテ励精事務ニ從ヘリ(筆者譯：被分配到各部門投入行政事務的作業)」(市毛淺太郎 1897: 159)的同時，也在外面扮演行政官的角色。基於這點，做為岩永六一的人物形象，可以推想此人具有很高的政策規劃能力與立即實現的行政運作能力。

《南征史》裡也有令人聯想到侯野保和行事的記載。

(4月下旬至5月中旬)学校教師等其生徒ノ為メニ日本語ノ教授ヲ我通譯官ニ請ウモノ數名アリ。又十三四歲ノ少年等來タリテ日本語ノ教授ヲ請フモノアリ。(4月下旬至5月中旬，澎湖島上的學校老師為了教育自己的學生，有幾位特來邀請我軍翻譯官教授日語。還有一個十三歲的少年來，要跟翻譯官學習日語。)(堀江八郎 1897: 156, 筆者譯)

《南征史》沒有明確記載所謂的翻譯官的姓名，但這項消息所描寫的場景與《臺灣語集》「緒言」所提到的場景恰恰相符。侯野保和(1895)編輯的《臺灣語集》「緒言」提及：

身は異邦の病床にあり、枕邊に土人の兒童を招き其の急遽の内に成れるを以て實に杜撰不整の者たるを免れず。(身在異國他鄉臥病於床榻，只好令當地孩童到我枕邊蒐集語言資料而成書。因而本書難免杜撰缺漏。)(筆者譯)。

1895年5月所寫的《臺灣語集》緒言內容，與同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南征史》的記載正好重疊。因此可以推測兩本書所寫的內容，很有可能是指同一事情。既然如此，可知侯野保和在澎湖島以兒童為對象，趁著教授日語的機會收集澎湖方言。可見緒言所謂的「枕邊に土人の兒童を招き其の急遽の内に成れるを以て實に杜撰不整の者たるを免れず」(筆者譯：只好令當地孩童到我枕邊蒐集語言資料而成書。因而本書難免杜撰缺漏)，應該不是編者的謙遜或藉口之語。

隨著戰鬥的結束，翻譯官的任務從搜集軍事情報轉為民生社會的調查。

1895 年 6 月總督府向比志島混成支隊查詢侯野保和的身份的調動，²²不久侯野保和 1895 年 9 月辭去陸軍省通譯的職務。之後經歷比志島少將的譯員，1896 年 2 月重新調為澎湖島翻譯官（詳見許雪姬 2012: 117），遞補了氣候難以適應之下所產生的缺額。²³

侯野保和在身份上歷經調動之後，還繼續從事與當地民眾直接接觸的任務。1896 年 4 月他對澎湖全島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人口調查。

勇邁なる侯野氏は昨年四月二日ボートに乗じて媽公を發し、²⁴六月三日に至るまで六十日間全島の調査を為し實に好土産を吾人に与へり。(勇敢的侯野先生去年搭乘小艇從媽公出發後，直到 6 月 3 日，花費 60 天的工夫調查了全島的人口，留下了很好的伴手禮給我們。)(《臺灣新報》1897-02-05 版次 02〈澎湖列島沿革史〉，筆者譯)

他在這裡也充分展現了臺語（廈門話）的能力。

5. 臺灣本島的翻譯官之譯事活動——關於侯野保和

在以北京話翻譯為主的臺灣總督府翻譯官之中，侯野保和的臺語能力似乎頗受器重。以下主要以《臺灣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等做為援引材料，以釐清初期臺語教本編者的生平。這批資料上所記載的部份資訊已在前人研究中提過。

當三旅團通譯侯野氏支那語の操縦自在にして日本語よりも確

²²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42 冊 48 號。這件公文書上寫著「股野 matano 保和」（英文拼音字母與下底線由筆者附加），但無疑是指與「侯野 matano 保和」同一人物。

²³ 據《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3 冊 18 號「当地ハ本年一月ヨリ非常ニ不順ノ氣候ニテ雇員四名巡查四名...病人ナリ。小官通訳官モ病氣ナリ。依テ股野 matano（英文拼音字母與下底線由筆者附加）通訳官及山下外二名上申方ノ採用至急辞令書廻ハサレタシ」（當地（指澎湖島）從今年一月一直到現在，氣候極不正常，雇員四名巡查四名...都得病。我翻譯官亦得病。故盼股野（=侯野）翻譯官與山下等二名已申請人才的採用手續儘速辦理），可見對當時的日人來說，澎湖島的氣候相當嚴酷難熬。

²⁴ 這段報導上只有「侯野臺灣」的簽名，但同樣附有「侯野臺灣」簽名的〈漳州地方巡遊記〉上所介紹的作者經歷（《臺灣新報》1897-01-29 版次 03）與侯野保和的經歷（《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3 冊 18 號）相符。因此可以肯定〈澎湖列島沿革史〉所謂的「侯野氏」是指侯野保和。

かなりと云ふ。氏廈門に在るとき既に臺灣語を修む。今や渡臺後數閱月、語音ほとんど土人に異ならず。(據聞第三旅團通譯官侯野先生漢語口語流暢自如，比日語還要好。他曾在廈門學過臺語，來臺不久之後，他的臺語已講得和臺灣人幾乎沒甚麼不同。)
(《臺灣新報》1896-10-28 版次 03，筆者譯)²⁵

為了追查這裡所謂的「侯野氏」，查勘侯野保和向臺灣總督府提交的親筆履歷書，就可知道侯野保和具有以下經歷(《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3 冊 18 號)。

- | | |
|--------------------------|------------------------------|
| 1875 年 11 月 3 日 | 出生。原籍福岡縣久留米市通町 |
| 1883 年 1 月至 1886 年 8 月 | 在通町小學校與日吉小學校念書 ²⁶ |
| 1887 年 1 月至 1889 年 9 月 | 在長崎跟英國人フリーマン學習英語 |
| 1889 年 10 月至 1889 年 12 月 | 跟從英國人スバステン經南洋諸島、臺灣淡水到福州巡遊 |
| 1889 年 12 月至 1892 年 10 月 | 在福州府學習福州話與廈門話，順便學習北京語 |
| 1892 年 10 月至 1893 年 3 月 | 旅行到廈門、汕頭、香港、澳門等進行考察 |
| 1893 年 3 月至 1894 年 5 月 | 在廣東府學習廣東話 |
| 1894 年 5 月至 1894 年 6 月 | 在香港國家醫院擔任日語翻譯 |
| 1894 年 6 月至 1894 年 8 月 | 在香港替北里、青山兩博士調查鼠疫病原時擔任翻譯 |

在這裡所寫的經歷與《臺灣新報》所披露的「氏廈門に在るとき既に臺灣

²⁵ 富田哲 (2008: 60) 也曾經利用過這份資料。

²⁶ 據久留米市立日吉小學校 (1974: 6)，1883 年合併東里、日吉等 6 所學校建立一所學校。所以雖然說是「在通町小學校與日吉小學校念書」，但侯野保和所念的學校只有一所學校。而他所謂的「通町小學校」的正式的名稱是「東里 (touri) 小學校」。由於這所學校位於通 (touri) 町，恐怕他是寫錯了。

語を修む（筆者譯：他曾在廈門學臺語）」，兩者之間並沒有矛盾。而且如本文後述所指，²⁷得以確認配屬於第三旅團司令部「侯野和吉」的別名是「侯野南洲生」，而「侯野南洲生」也就是「侯野保和」。所以，可以推知《臺灣新報》所謂的「當三旅團通譯侯野氏」就是侯野保和。

侯野保和在當時的翻譯官之中算是具有奇特外語學習經驗的人才，且在日本開始統治臺灣之前就學好臺語（廈門話）。若照報紙報導，他的臺語（廈門話）運用能力可說相當高明。考慮到他的廈門話的學習背景以及在廈門逗留的期間，「語音ほとんど土人に異ならず（筆者譯：臺語講得與臺灣人幾乎沒甚麼不同）」未必是誇大之詞。侯野保和具有如此高明的臺語（廈門話）能力，是與其他明治時代初期翻譯官相當不同之處。

原來從江戶時代末期到明治時代初期正處於日本外文教育的變革時期，也算是英語或北京話取代荷蘭語或唐話（南京話）受到重視的時代。因此，在江戶時代世代相傳把唐話翻譯傳承下來的長崎通事，到了明治初期就得拋棄南京話的學習重新改念北京話以維持通事的門第。還有一種背景則是，有些唐通事（南京話翻譯）看到淪落得十分不堪的清國，因而從漢語翻譯改為英語翻譯。

28

看侯野保和的經歷，可知他 12 歲就開始學習英語，14 歲學習福州話與廈門話之外，還學習北京話。²⁹這種經歷令人聯想到當時長崎通事中的「福州口」（福州方言翻譯）或「漳州口」（漳州方言翻譯）子弟為了適應新時代，把代代相傳的祖業依依不捨地改為英語翻譯的情況。侯野保和原籍久留米，雖然離長崎還有一段距離，但同樣地屬九州北部文化圈內。而且 12 歲就在長崎學英語的經歷也饒富啟發。把他設想為福州口或漳州口的後裔，就較容易了解他那麼年輕就開始學英語及中國各地方言的源由。至於侯野保和的家系，就等日後再進行查明。

且說 1895 年 6 月雖然總督府在臺北舉行始政式，但不一定能得到臺灣人民的信服。第二代總督桂太郎在始政式 1 周年 1896 年 6 月發佈了總督訓示表明今後的施政方針。但對一般臺灣老百姓來說，無法了解為何突然開始了日本

²⁷ 參見註腳 32。

²⁸ 六角恒広 (1981: 473) 及六角恒広 (1988: 410) 指出：1862 年由唐通事設立學校，在那裡開始教授唐通事子弟英語。

²⁹ 親筆履歷書的原文是「福州語廈門語傍ら北京語修行」。以福州話與廈門話為主要的學習語種這一點格外令人好奇。

統治，於是總督府匯集民衆召開說明會。這時，少不了要翻譯官大顯身手。而前述報導還持續提到：

（俣野保和は 1896 年 10 月）去る十九日本願寺開導學校に土人の事務取扱及び紳士百六十余名を集めて土語演説会を催し、日清戦争之起議及び該始終と云へる題にて過般戦争の起源より東洋の大勢に論究し、馬関条約台湾割讓の事等を説明したれば、聴衆をして醒覺感動せしめたる処尠からざりし様見受けたり。

（俣野保和於 1896 年 10 月 19 日，在本願寺開導學校裡匯集當地人與事務官員以及士紳共 160 人舉辦臺語演説會，以甲午戰爭為主題論及本次戰役的始末，乃至東洋大局，以及由於馬關條約而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一事，頗讓聽眾深受說服與感動。）（《臺灣新報》1896-10-28 版次 03，筆者譯）。

報導的表達方式雖然稍有誇大其詞之處，但可以推測俣野保和所說的臺語（廈門話）確實具有動人心絃的力量。

俣野保和日後依然繼續從事譯事活動。至少，他從 1897 年 1 月開始使用「俣野臺灣」的筆名在《臺灣新報》上，除了發表漳州訪問記事（《臺灣新報》1897-01-27 版次 03、1897-01-28 版次 03、1897-01-29 版次 03）及介紹福州、香港的情況（《臺灣新報》1897-02-14 版次 02、1897-02-18 版次 03、1897-02-20 版次 02 以及 1897-04-14 版次 02）之外，且以〈戰役後の清国〉為題分析敗戰後中國的軍事狀況（《臺灣新報》1897-06-20 版次 02）。然後又在同年 4 月開始使用「俣野南洲生」的筆名，³⁰從臺南發出時事訊息。刊登在《臺灣新報》的〈英領ボルネオ島〉則是把歐美的新聞摘譯為日文（《臺灣新報》1897-05-26 版次 05），可說充分發揮了他的語言天份。之所以從臺南投稿到《臺灣新報》是因為當時俣野保和在第三旅團司令部受命為翻譯官因而住在臺南。³¹俣野保和雖然身為翻譯官，但實際上從事形同媒體工作者或特務人員的活動。

俣野保和 1897 年 8 月 25 日以「俣野和吉」刊行臺語教本《軍人用臺灣語》。這時俣野保和用「俣野臺灣」「俣野南洲生」、「俣野和吉」等姓名陸續發出與

³⁰ 有些資料寫的是「南洲生」（下底線由筆者所劃），例如《臺灣新報》（漢文版）1897-05-05 版次 01 及《臺灣新報》1897-06-20 版次 02。但俣野保和（1987）《軍人用臺灣語》緒言裡自稱「南洲生」，所以可知「南洲生」是對的。

³¹ 根據俣野和吉（1897: 1）以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453 冊 56 號，這時的俣野保和屬於第三旅團司令部。

中國相關的信息。³²此外，1898年7月為偵察中殉職身亡於曾文溪的陸軍通譯官山本長喜舉行葬禮時，侯野保和甚至以23歲的年紀擔任喪主（《臺灣日日新報》1898-07-23、版次02）。

以一般翻譯官的標準來說，侯野保和算是受到優厚待遇的。例如，1896年2月他在澎湖島同一期翻譯官中領到最高的薪水（許雪姬 2012: 117）。³³然而在臺灣本島應有他的長輩，他還超過長輩擔任了喪主。根據這個事實就可以推測侯野保和受命於山本長喜所屬的組織系統或職務，因而被選為喪主。這麼說來，此舉可算是在當時統治還未趨穩定的臺灣南部，侯野保和從事軍事偵察活動。前面所說的在漳州收集情報活動與對敗戰後清國軍事的分析等，都證實了這個推測。因此，《軍人用臺灣語》這本針對軍人而編寫的教本編纂活動也可納入其譯事活動，並推知侯野保和的翻譯者形象。包括他精通五門外語，且是敵區收集軍事情報的將官等形象。這一點與另外一本初期臺語教本的編者岩永六一，各有相當不同的特徵。

6. 臺灣本島的翻譯官之譯事活動——關於岩永六一

比志島混成支隊 1895年6月3日為了攻打基隆，離開澎湖島開往臺灣本島（參謀本部 1907(第7卷): 19、堀江八郎 1897: 160-167）。跟隨比志島混成支隊一起到臺灣本島的岩永六一日後依然繼續從事譯事相關活動。同年10月他當了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雇員（《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44冊94號），1896年11月兼任內務課長並在澎湖島媽公的澳務署受命為署長（《臺灣新報》1896-11-05 版次03；許雪姬 2012: 116）。這時在澎湖島上的岩永六一其政治影響力極大。當時的報紙報導指出：

³² 至於「侯野和吉」與「侯野保和」是否同一個人物，如許雪姬（2012: 118）所說，可參閱侯野保和（1987）《軍人用臺灣語》〈傳耿光序〉所介紹的侯野和吉經歷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3冊18號所揭示的侯野保和履歷是相符合的。此外，《軍人用臺灣語》序文所提到的內容與《臺灣語集》緒言的內容也相符合。故可推估「侯野和吉」與「侯野保和」應屬同一個人。又，《軍人用臺灣語》裡，「侯野和吉」把自己的筆名稱為「南洲生」，而以「侯野臺灣」的簽名所發表的報紙報導（《臺灣日日新報》1897-01-29 版次03）的著者經歷也與侯野保和的履歷（《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3冊18號）恰恰符合，所以可以推估「侯野保和」、「侯野臺灣」、「侯野南洲生」、「侯野和吉」都是同一人。

³³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03冊18號。具體而言，侯野保和的薪水是45元，再過來的翻譯官薪水是35元、11名中最低薪水是15元。

岩永氏は通譯なる本職の他、内務課長と澳務署長とを兼ね、飛ぶ鳥を落とす程の勢いあり。(岩永六一雖然以翻譯為其本業，但除了內務課長之外，還兼任澳務署長，他強大的威勢可說是厲害得連飛鳥也打了下來。)(《臺灣新報》1896-11-05 版次 03，筆者譯)

依然擁有強大政治影響力的岩永六一在澎湖島上從事公務活動之後(許雪姬 2012: 116)，³⁴1897 年受邀至臺南(《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532 冊 123 號)，1899 年他從臺南縣調到鐵道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550 冊 28 號)，在鐵道部先被任命為秘書掛長(臺灣總督府鐵道部 1911: 8)，後在 1902 年調到總務課(後運輸課)被任命為常務掛長從事縱貫鐵路建設事業。當時報紙常報導他以鐵道部官僚的身份出差到各地的情況(例如《臺灣日日新報》1903-04-16 版次 02、1903-05-07 版次 02、1905-02-05 版次 02 等)。以下是岩永六一前往南部參加通車典禮的報導。

鐵道部常務掛長岩永六一氏は南部鉄道開通式に列する為め本日同地へ出發せり(鐵道部常務股長岩永六一先生為參加南部鐵路通車典禮，今天前往南部。)(《臺灣日日新報》1903-12-06 版次 02，筆者譯)

由此可見，岩永六一對建設鐵路事業貢獻很大。他身份雖然原本是翻譯官，但實際上卻從事行政任務。1904 年 6 月他受到公務方面的肯定，敘為勳七等(許雪姬 2012: 116)。

他完成攻打澎湖島的任務之後，在澎湖島上當了澳務署長充分施展其行政能力，而調到臺灣本島之後在鐵道部受命為總務課(運輸課)常務掛長，對鐵道事業也有所貢獻。看他的任務、職務、及其成就，與其說是翻譯官，不如說是行政官。

當時要做高官，除了要有很高的學歷之外，還要有很管用的途徑。那就是在當時日人所說的「新天地」擔任翻譯官。譬如，晉升到翻譯官中最高位階高等官四等的小野真盛(小野西洲)，回顧年輕時有感而發說，以前輩翻譯官的成功為榜樣刻苦向學終於實現了弘願(小野西洲 1935: 81; 楊承淑 2014: 50)。

1904 年前半(1 月至 7 月)《臺灣日日新報》刊登岩永的出差報導共有 7

³⁴ 有關澎湖島的政務，報紙報導岩永以主要來賓之一受到邀請。(《臺灣新報》(漢文版) 1897-01-23 版次 01、《臺灣新報》1897-01-24 版次 03)。

次（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也包含在內），之後突然找不到有關他的報導。直到約半年後的 1905 年 2 月 5 日《臺灣日日新報》才有了以下的報導：

鐵道部常務係長（筆者註：係長 kakaricho＝掛長 kakaricho）岩永六一氏は病氣の爲め本日の船便にて内地に帰省する由。（鐵道部常務股長岩永六一因病今日搭船返回內地）（《臺灣日日新報》1905-02-05 版次 02，筆者譯）

返回內地不久，岩永六一於 1905 年 2 月 17 日在故鄉長崎逝世（《臺灣日日新報》1905-02-21 版次 02），並結束其官吏生涯。

在澎湖島完成任務之後的岩永六一，與侯野保和同樣調到臺灣本島，但岩永六一在臺灣本島上的譯事活動與侯野保和相較形成鮮明的對比。

7. 結論

日治時代最初期的臺語教本是在戰役環境之下，由以上所揭示的人物所編寫的。編者侯野保和與岩永六一都同樣前往澎湖島以翻譯官身份參加攻打澎湖島的戰役。但站在戰鬥的第一線從事收集情報活動為本隊帶路的侯野保和，和眼光長遠考慮到日本的國家百年大計而意圖對澎湖子弟進行日語教育的岩永六一之間，形成明顯的對比。

兩者的差異隨著兩人從比志島混成支隊翻譯官調到臺灣總督府翻譯官的身份調動顯得更為明顯。侯野保和 1896 年 10 月在臺北市本願寺內以臺語（廈門話）講述甲午戰爭始末以及東洋大局充份施展了翻譯官的卓越本領。但岩永六一在同一個時間 1896 年 11 月置身澎湖島，除了內務課長之外還兼任澳務署長，顯示了強大的政治權勢。其後，侯野保和在臺南軍營從事收集軍事情報活動，岩永六一則在臺北總督府邁向高官之途，以鐵道部總務課（運輸課）常務掛長的身份貢獻於縱貫鐵路的建設，並敘為勳七等。

其中的差異之所以產生是由於本來會講臺語（廈門話）的侯野保和與只會北京話的岩永六一所形成的差異，也是留在譯事活動現場的侯野保和與透過譯事活動做為晉身階梯邁向官吏之途的岩永六一之間的重大差異。

透過以上的研究梳理，我們能夠釐清以下幾點。

- (1) 不少來到臺灣的翻譯官是由宗方小太郎進行面試錄取的。
- (2) 比志島混成支隊的翻譯官是淺野源二郎、永田虎之助、侯野保和、岩

永六一。

- (3) 侯野保和是 1894 年 11 月 9 日在大本營受命為陸軍通譯之後，1895 年 2 月 17 日配屬到比志島混成支隊。岩永六一是 1895 年 2 月 9 日由宗方小太郎在廣島進行面試之後，2 月 11 日收到錄取通知。
- (4) 侯野保和除了英語之外，還受過福州話、廈門話、北京話、廣東話的訓練。此一經歷與明治初期能操福州方言或漳州方言的長崎通事後裔的教育經歷符合。他在登陸澎湖島作戰時充分施展其語言能力，並收集當地軍事資訊替本隊帶路。他在澎湖島上從事行政廳事務之後，受命為軍紀隊成員，保護「立誓恭順的當地民眾」并扼制「當地的不逞之徒」。日後還在澎湖全島進行人口調查，後來在漳州收集情報並對敗戰後的清國軍事情況加以分析。以第三旅團司令部屬下的翻譯官立場，扮演了如情報將官之類的角色。
- (5) 岩永六一很可能是以嚴姓為祖先的長崎通事岩永嘉十郎的後裔。他於日軍佔領澎湖島後不久，以日本佔領者的觀點思考國家百年大計，意圖為澎湖島少年進行日語教育。另外又在佔領之後的澎湖島行政廳從事行政事務，之後除擔任內務課長之外還兼任澳務署長，其強大的權勢可說是「厲害得連飛鳥也打了下來」。他在臺灣本島上依然持續走官吏之途，在鐵道部總務課（運輸課）受命為常務掛長，為臺灣縱貫鐵路建設貢獻良多。在此過程中，發揮其政策規劃能力與行政運作能力，敘為勳七等。

然而，如前人研究所指（參見吳守禮 1955: 2；樋口靖 2012: 34；伊原大策 2013: 78-84），侯野保和所編的《臺灣語集》與岩永六一所編的《臺灣言語集》兩本臺語教材有不少非臺語（非廈門話）特徵。尤其是侯野保和所編的《臺灣語集》裡出現了「別動 動くなかれ」（侯野保和 1895: 40）、「你別帳羅 お構ひ被下るな」（侯野保和 1895: 48）等會話句令人大感突兀（伊原大策 2013: 80）。這根本不像是受過臺語（廈門話）訓練的人會寫的句子。因此據本文所爬梳的編者經歷看來，在岩永六一所編寫的《臺灣言語集》裡有著北京話的影響是難免的，但侯野保和所編的《臺灣語集》裡有如此非臺語特徵令人深感困惑。

除了這點之外，《臺灣語集》還有不少編輯上的失誤。例如，這本書的書名並未統一，封面上寫著「臺灣語集」，但開頭第一頁（緒言之前）翻開來就

是幾個大字寫成的「臺灣日用土語集」；但本篇開始的第一頁（緒言之後）卻是「臺灣語集」幾個大字，而卷末最後一頁（版權頁之前）竟然又寫上「臺灣土語 終」。可見這本書沒有好好編輯規劃就匆匆出版了（伊原大策 2013: 80）。

為了查證《臺灣語集》的出版過程，筆者著手檢視這本書的再版本，結果有了出乎意料的發現；再版的第一頁竟然刪去了《臺灣日用土語集》的書名，而第四版³⁵的第一頁，還是同樣沒有《臺灣日用土語集》的標題。也就是說，只有第一版的開頭第一頁（緒言之前）才有「臺灣日用土語集」。現在研究者之間之所以把這本教材叫做「臺灣日用土語集」，是因為日本國會圖書館的數位資料庫所公開的封面影像，就是「臺灣日用土語集」的關係。然而這封面顯然不是原來的封面，一看就知道是以手寫的紙貼上去的，而這張手寫的紙是根據第一版的開頭才有的「臺灣日用土語集」寫上去的。這本書原本的封面是如張良澤所指出的「臺灣語集」（張良澤 1984: 142）。既然如此，這本教材似乎不該稱為《臺灣日用土語集》，而應該叫做《臺灣語集》才對。

至於版本的問題，由於篇幅有限，未來將以另稿再行探討（參見伊原大策 2014）。

目前這兩種臺語教本仍然留有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侯野保和編寫的《臺灣語集》裡，含有編集上的失誤以及版本之間的矛盾，不能等閒視之。

引用文獻

- Macgowan, John. 1871. *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 Amoy: Chuikeng Tong.
- 久留米市立日吉小學校. 1974. 《開校九十週年紀念誌》。久留米：久留米市立日吉小學校。
- 大里浩秋. 2008. 〈宗方小太郎日記 明治 26 至 29 年〉，《人文学研究所報》（神奈川大学）41: 31-107。
- _____. 2010. 〈宗方小太郎日記 明治 30 至 31 年〉，《人文学研究所報》（神奈川大学）44: 19-71。
- 川崎三郎. 1897. 《日清戰史》。東京：博文館。
- 小野西洲. 1935. 〈自叙漫言〉，《語苑》28.12: 81-86。

³⁵ 由於找不到第三版，目前無法確認是否有第三版。

- 六角恒広. 1981. 〈唐通事と唐話教育〉,《早稻田商学》292: 455-477。
_____. 1988.《中国語教育史の研究》。東京：東方書店。
- 市毛淺太郎. 1897.《征臺顛末》。水戸市：日進堂。
- 伊原大策. 2013. 〈日治初期的臺語教本系譜〉,《編譯論叢》6.2: 67-98。
_____. 2014. 〈日本統治時代最初期における台湾語教本とその著者〉, 陳麗君主編《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1: 12之1-12之26。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
- 吳守禮. 1955.《近五十年来臺語研究之總成績》。臺北：大立出版社。
- 村上嘉英. 1965. 〈プロテスタント宣教師の閩南語研究—異民族伝道と言語の問題—〉,《日本文化》44: 66。
- 町田政吉. 1994. 〈澎湖島上陸開戦準備〉, 町田政吉編《町田政吉の記録》, 54-58。福生市：町田政壽。
- 岩永六一. 1895.《臺灣言語集》。大阪：中村芳松。
- 松島剛、佐藤宏. 1897.《臺灣事情》。東京：和田篤太郎。
- 俣野和吉. 1897.《軍人用臺灣語》。東京：軍事教育會。
- 俣野保和. 1895.《臺灣語集》(又名《臺灣日用土語集》)。東京：民友社。
- 神谷正男. 1975.《宗方小太郎文書》。東京：原書房。
_____. 1977.《続 宗方小太郎文書》。東京：原書房。
- 許雪姬. 2006. 〈日治時期臺灣的通譯〉,《輔仁歷史學報》18: 1-44。
_____. 2012. 〈臺灣語集中顯現的澎湖歷史—由日治時期最早編成的《臺灣言語集》・《臺灣日用土語集》談起(上)〉,《碯「石古」石》69: 96-126。
- 富田哲. 2008. 〈日本統治開始直後の「臺灣土語」をめぐる知的空間の形成〉,《多言語社会研究会年報》5: 56-77。
_____. 2010. 〈日本統治初期の臺灣総督府翻訳官—その創設およびかれらの経歴と言語能力—〉,《淡江日本論叢》21: 151-174。
- 堀江八郎. 1897.《南征史》。東京：春陽堂。
- 樋口靖. 2012. 〈領台初期の台湾語教学(一)〉,《文学部紀要》(文教大学)25.2: 23-40。
- 張良澤. 1984. 〈台湾語とは?—台湾語著作書誌を兼ねて—〉,《外国語教育論集》(筑波大学)6: 141-176。
- 遠藤永吉、岡崎茂三郎. 1895.《日清戦争始末》。茨城県：須永作太郎・清水鉄吉・内田安藏。

- 參謀本部. 1907.《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東京：東京印刷株式会社。
- 楊承淑. 2014.〈譯者的角色與知識生產：以臺灣日治時期法院通譯小野西洲為例〉，《編譯論叢》7.1: 37-80。
- 穎川君平. 1897.《譯司統譜》。神戶：穎川君平。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4.《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三編。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 1911.《臺灣鐵道史》中卷。臺北：臺灣總督府鐵道部。

伊原大策

日本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系

ihara.daisaku.gb@u.tsukuba.ac.jp

Two Authors of Taiwanese Language Teaching Textbooks at the First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Era

Daisaku IHARA
University of Tsukuba

Among the Taiwanese textbooks for Japanese people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in Japanese occupation era,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first period, there are confusion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ir contents and many non-Taiwanese elements were contained in them. Not only did these textbooks contain Japanese elements, but even Mandarin elements were significantly observed. Thus, in order to make reference to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f these textbooks,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who edited them and what processes these editions went through. However, no studies have been found so far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makes reference to two such textbooks of such age. On the basis of fragmental pieces of data gathered by the author, this paper first clarifies the process of how the interpretation officer of Hishijima Konseishitai, was employed and the interpretation activities by two textbook editors, Matano Yasukazu and Iwanaga Rokuichi. Secondly, images of the two interpreters which come out of the above clarification are describ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images and the contents of these textbooks are analyzed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f these textbooks are reconsider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Taiwangoshu, Taiwan nichiyō dogoshu, Taiwan gengoshu, Matano Yasukazu, Iwanaga Rokuichi